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221

# 中国问题、民族身份与理论创新

## ——兼答王伟博士

李自雄

(山东大学威海校区 文化传播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 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思考,面对现实,不意味着取消理论;对域外理论不反对“拿来”,但“拿来”要有所分辨,不能以所谓理论的“一般性的价值”而忽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及可能存在的不适性;反对狭隘的民族自尊,要求以更为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不应是民族身份丧失的文化盲从,崛起的中国需要人文学者的在场,理论建设在面向世界的同时,也要从中国文化身份出发,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并为世界贡献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创新成果。

**关键词:** 中国问题; 民族身份; 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I0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5)02-0142-05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问题”是学界比较关注的话题,笔者围绕这一问题有较多思考,并参与了相关讨论<sup>[1][20-27][215-18][3]32-35</sup>。最近王伟《中国问题、文论旅行与原创焦虑》<sup>[4]94-99</sup>对一些看法提出反驳。对于王伟的观点,已有过商榷和回应<sup>[2]15-18[3]32-35</sup>。鉴于王伟观点代表了学界部分人的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必要作出回应。

通观这次王伟的反驳,其核心内容是(为避免断章取义与曲意附会这里原文照录):“讨论中国问题时,应该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复杂性,尤须摆脱那种形而上的理论化迷思,尊重男男女女汹涌如潮的切肤体验;应该妥善处理好中国文学体验与域外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能以特殊性否认乃至对抗一般性的价值;应该致力于理论启蒙,致力于融会贯通后的自然创新,放弃原汁原味式理论原创的幻想,进而消除因其不可得而引发的焦虑与怨恨”<sup>[4]94-99</sup>。

值得肯定的是,王伟认为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与思考,需要摆脱“那种形而上的理论化迷思”“尊

重男男女女汹涌如潮的切肤体验”,也就是其所谓的“立足于现实感受来说的问题”,即王伟列举的诸如“下岗工人问题,失学问题,贫富悬殊问题,能源利用高成本问题,医疗问题”<sup>[5]14-17</sup>,还有“国际关系、国有企业、思想解放、收入分配、信仰危机、环境恶化、社会舆论、物价、就业、人口、腐败,等等”这些问题,都在事实上“已经深刻地形塑了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刻骨铭心地影响着他们对现实的切身感受”<sup>[4]94-99</sup>。这样对于强调理论研究应立足于“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与“现实感受”,恢复与现实纬度不可或缺应有联系,也就是“接地”,从而走出割裂现实与历史的本质主义迷途,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王伟似乎没能注意到的是,无论对现实问题有多么强烈的切身感受,都不能取代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这些“立足于现实感受来说的问题”是不是能停留于“现实感受”?作为理论研究者,是否能放弃深层次的理论追问?<sup>[2]15-18</sup>这也诚如王伟援引雷蒙德·威廉斯的话所指出的“一方面我们需要范围广泛、灵活多变的概念性思考,抽象使这种思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思考要有相关性,我们

收稿日期: 2014-09-15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反本质主义语境下的文论反思与话语重建”(13DWXJ03);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反本质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重建”(J12WE7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4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国当代文论转型问题研究”(2013M541895);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反本质主义语境下的文学理论反思与重建”(201203073);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科研项目“中国儒学政治传统的形而上学基础与文学本质观研究”(12RXYB32);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教研基金资助项目“文论转型与文学理论课程教改建设”(B201403)

作者简介: 李自雄(1974—),男,博士,副教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E-mail: lizixiong5000@aliyun.com

①为了更加全面的分析与了解,下文笔者还将联系王伟博士其他相关的文章作出论析。

还需要来自现实关系的持续压力,需要一种能够赋予描述过程以实质内容的实际的共同生活”<sup>[6]</sup>,也就是说强调对现实的介入,也需要对这种现实的“抽象”与“概念性思考”,换言之,并不意味着这种介入就停留于“现实感受”,还要具有某种“反思、批判和超越的品格”<sup>[7]</sup>,这就是对现实更重要的意义。就此来说,“立足于现实感受来说的问题”,不仅是王论所指出的,“必须经由‘穿越’而到达‘理论问题’才算合格”<sup>[5]4-17</sup>,并且由此形成理论研究的必然过程与应有之义<sup>[2]5-18</sup>。

我们并不反对“立足于现实感受来说的问题”,也不反对有感而发,总比无病呻吟好,然而其结果也许就正如高建平所指出的,“从实物和人们的感受,可以产生一些想法,但由此所生长出来的,很可能只是一些随感式的批评。随感当然是好的,真正有感而发就更好,但这不能取代理论的建设”<sup>[8]3</sup>。

从逻辑上来看,王伟的论述也是有问题的。王伟“立足于现实感受来说的问题”,让人费解的是,若是仅仅停留于“立足于现实感受来说的问题”,又怎么能达到“探究它究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立足全局、究其根本”,从而“更为全面而透彻地弄清中国问题,进而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对策”<sup>[4]94-99</sup>?这显然在逻辑上说,陷入了自相矛盾的逻辑困局与理论困境。行文至此,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王伟曾指责笔者的商榷(称“李文”)不合逻辑,并似乎也言之凿凿:“李文开篇说本人与所批判的理论家‘并无意见上的分歧’,但紧接着又说‘他们的分歧概括起来,大致有三’。前后矛盾。”<sup>[4]94-99</sup>在此,也不妨照录一下拙作原文以作比较鉴别,拙作的原文是这样开篇的:“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需要有‘问题’意识,并且需要有‘中国问题’意识,这无疑是正确的,通观王伟博士的《何谓文艺学论争的“中国问题”》一文,王伟博士和他所批判的‘理论家’对此并无意见上的分歧,他们的分歧概括起来,大致有三:一是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问题’;二是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有效性问题;三是具体到对‘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认识问题。”<sup>[2]5-18</sup>其实,对于拙作的这段原文,稍有语法与逻辑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笔者说王伟与所批判的理论家“并无意见上的分歧”,是有前提的,是有所特指的,即二者在“文艺理论研究需要有‘问题’意识,并且需要有‘中国问题’意识”这一点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分歧,但在如何理解与认识“中国问题”上是有分歧的,这也正是“他们的分歧概括起来,大致有三”所要具体谈及的。这在逻辑上有何不通?显然是王伟所谓“掐头去

尾、无视语境”<sup>[9]19-23</sup>断章取义。任何理论主张及言说,都必须具有逻辑自洽性,否则,分析起来就难免如王伟所说的“稀里糊涂”“机械地堆砌”或是“耳食他人而缺乏自己的成熟考虑”,在“行文逻辑”上“掉链子”<sup>[9]9-23</sup>,甚至陷入自相矛盾。如上所述,乍看起来,王伟的分析,不乏大量的例子,也有诸如雷蒙德·威廉斯等人的权威理论,但只要略加分辨,就不难看出只不过是所谓的“机械”的“堆砌”或“耳食他人”,而没有消理解,比如前述王伟援引雷蒙德·威廉斯的那段话,雷蒙德·威廉斯显然并不反对必要的“抽象”与“概念性思考”,而颇为反讽的是,却被王伟引为其拒斥这种“抽象”与“概念性思考”的理论支撑,王伟这样在“行文逻辑”上“掉链子”而陷入难以摆脱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并不少见,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 二

王伟对域外理论与“中国问题”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看法,或者说提出了反驳意见,具体到文学方面,即是认为应该“处理好中国文学体验与域外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能以特殊性否认乃至对抗一般性的价值”,这种看法显然是有其合理性的。

历史的教训已够深刻,要“睁眼看世界”,但睁眼看世界也是要有辨别的。客观地说,如王伟所言“晚清以来,域外传入的大量理论资源共时式地平面铺开”<sup>[4]94-99</sup>,以至于“回望历史,近代以来又有多少西方的新思想潮水般涌入中国?没有它们的大范围普及与接受,恐怕我们还没那么快就不用跪伏于地山呼万岁,而可以脱掉长袍马褂、男女同校、抛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等等。毫不夸张地说,曾经是西方的那些思想早已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并“都是理所当然”的了<sup>[9]19-23</sup>。的确,西方思想理论曾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王伟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理论的确当性问题。正如笔者所曾作出的追问,这些理论资源的普及与接受,及至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是王伟所说的“理所当然”的吗?显然不是。不要以为这一切的发生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不须辨别分析(这显然不是王伟所谓“头脑发热”<sup>[9]9-23</sup>所能做到的,而需要理性的分析判断),因为这里关涉到一个理论的适用性与有效性问题,王伟似乎没有看到,中国近现代以来,西方那么多理论,并有许多理论不乏“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并非没有借用西方理论,而且不在少数,但不意味着普遍有效,都能解决得了“中国问题”,而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也在

于此(王伟所举林则徐的例子),包括新文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问题也概莫能外,中国“启蒙”的艰难历程也印证了这一点<sup>[2]15-18[3]32-35</sup>。

诚然,“在现今‘地球村’的时代,思想与理论市场上的角色形色各异,相互影响,相互渗透”<sup>[9]19-23</sup>,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问题”也是一个“全球问题”,不可能置身于“全球问题”之外,并构成探讨“中国问题”的题中之义与理论背景,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这样一个问题更值得深思,即:无论如何强调“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的密不可分(的确也是事实),也无法否定“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并必须面对这种特殊性<sup>[2]15-18[3]32-35</sup>。也如王伟所指出的,中国“无法逃脱全球版图的‘魔掌’”<sup>[5]14-17</sup>,西方“率先走向现代的国家遇到过环境污染、权力腐败、人性堕落、文化低俗等等问题,这些恐怕也是中国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sup>[4]94-99</sup>,要面对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西方的先行者又有哪些可供借鉴的良好经验及应避开的陷阱等等”<sup>[5]14-17</sup>,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是否正是面对西方的先行者这种利弊共在的事实而更需要我们不能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可能隔绝于世,幽居空谷去练某个包打天下的理论神功”<sup>[9]19-23</sup>,对域外理论并不反对“拿来”,但“拿来”也是要有有所分辨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拿来主义”不加分辨,往往“会产生某种假象,那就是外来理论在解释中国文化问题时似乎普遍有效”<sup>[10]21-26</sup>,从而忽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及可能存在的不适性,王伟的问题正在于此。

在这种“似乎普遍有效”的理论幻觉之下,王伟批判其所批判的“理论家”们“忽略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sup>[5]14-17</sup>,却没能意识到自己忽略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走过风风雨雨之后也并未见到其所期盼的彩虹,“似乎普遍有效”终究只是一种理论幻觉,这也许是王伟未曾想到的。而这样一种理论幻觉,也使文学研究对域外理论“在术语、概念和措辞的移植和更新方面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而对这些概念术语由以产生的现实根源,对它们指称外在于理论话语的文学实在的确当性问题,常常缺乏严谨的考校和细心的鉴别,因此往往给人以名实错位、似是而非、言不及义、隔靴搔痒的感觉”<sup>[11]82-87</sup>。就此而言,这确乎不是仅仅表现于王伟的个别现象,许多研究不是从中国的历史语境与现实状况出发,而是对西方理论及其话语的照搬挪用,从而造成了对“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及可能存在的不适性的忽视,正是在此意义上,这样的一种研究,正如有学者曾指出的“只是借用他人的概念术

语衣装演练了一场堂皇而缺乏神采的戏”<sup>[12]13-19</sup>,在“似乎普遍有效”的理论幻觉下,缺乏对“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的充分把握,从而也就远离了真正的现实中国及“中国问题”。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以特殊性否认王伟所说的“一般性的价值”<sup>[4]94-99</sup>,对于域外理论,包括西方理论,只要能解决“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借鉴?而是说需要对这些理论(具有一般性)在“中国问题”(具有特殊性)的适用性与有效性上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王伟所举的马克思主义即是很好的例子<sup>[4]94-99</sup>,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并不能构成域外理论在认识与解决“中国问题”上“普遍有效”的事实与依据,相反,它有力说明了任何理论尽管具有“一般性的价值”,但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否则,就无济于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与解决,甚至是适得其反,中国近代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和事实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任何理论资源,包括西方理论资源,都不否认其具有王伟所谓的“一般性的价值”,并且都是可以借鉴的,只是要明白:这种借鉴已经发生了理论语境的变化,所面临的是“中国问题”,并需面对“中国问题”的特殊性,非此,就会流于对西方理论的盲从而无益于“中国问题”的解决。

### 三

对于理论创新问题,王伟认为理论创新的前提是对理论资源的“融会贯通”,应该“致力于融会贯通后的自然创新”“放弃原汁原味式理论原创的幻想,进而消除因其不可得而引发的焦虑与怨恨”,即“一种狭隘的民族自尊所孕育的怨恨”<sup>[4]94-99</sup>。显然,这种狭隘的民族自尊所孕育的怨恨和焦虑是不足取的,在这一点上,王伟是正确的。

王伟所谓的狭隘的民族自尊,“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和‘读经热’在中国大陆迅速盛行起来,儒学热中裹挟了民族主义情绪……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大陆应运而生,重新崛起”<sup>[13]4-20</sup>,并给中国理论界带来了巨大影响,引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新重视,但同时也滋生出了一种理论研究的保守主义倾向,典型的比如所谓“西学源出中国”说。对于这种“西学源出中国”说,如王伟所指出的“在‘洋务派’那里就已经运用娴熟。不同的是,它是为洋务运动造势,针对那些反对洋务论的人所做的辩护”<sup>[4]94-99</sup>。在这个意义上,“西学源出中国”说不过是晚清以来的传统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领域的复活,不仅不合时宜,其所谓思想原创的创新性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狭隘的民族自尊及其所孕育的怨恨和焦虑是要不得的,正如上文所述,从近代开始,西学东渐,西方理论进入国门,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是客观的事实。就文学领域而言,这些西方理论,用王伟的话来说,即是“它们始而在‘文学革命’的大旗下精诚团结,一同攻击雕琢、陈腐、艰涩的封建文学,继而在新文学内部为争夺话语权而掀起‘为人生’‘为艺术’之争。紧接着,‘革命文学’勃然而兴,文论的左翼化力量从此渐趋强大,直至最后陷入极‘左’的陷阱。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论从最初的‘盗火者’一变而成被压抑者,甚至是谈者色变。因此,应该在极‘左’文艺难以为继这一大背景下,来看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波澜再起,它以再启蒙为旨归,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潮遥相呼应。如此的历史契机给中国文论打上了浓重的西方色调”,而近现代以来,也是受西学“学科化”“体系化”与“范畴化”的影响,“在吸收域外文论资源的基础上,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论话语与文论体系”<sup>[14]94-99</sup>。对于这一“在吸收域外文论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文论话语与文论体系”,王伟似乎没能看到其另外一面的事实,即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论,有“破”(破除过去各种僵化的文学观念与模式),有“引”(引进西方文论的古今资源),尽管也有“建”,但与“破”“引”相比,后两方面的推进显得更为突出,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引”的方面更是几近于与西方理论的产生同步,盲目崇洋、生搬硬套、照搬照抄、食洋不化者多,而自身理论的建构却显得相对不足<sup>[14]13-17</sup>,显然未能达到王伟所谓“致力于融会贯通后的自然创新”<sup>[14]94-99</sup>,诚如有学者所言“我们虽然学会了移植与引进理论,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运用这些理论中所包含的思想向自己的现实提问”<sup>[15]5-11</sup>,即便是那些影响较大的理论命题,如文学主体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新理性文学精神论等,也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从整体上看,真正富有时代精神和创新性的理论建构并不多见”<sup>[14]13-17</sup>。而这又是与长期以来对异质文论,特别是西方文论的“过度移植与依赖”相关联的,“这就造成了对西方文化和文论的依附性,从而养成了中国人文学者的眼睛向外的思维惰性,也一定程度上窒息了他们的创新意识和理论创造力”<sup>[16]6-14</sup>,也导致了“我国文论知识构成的内在性危机”及“‘身份认同’方面的内在失落”,使“我们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甚至“较大范围地产生‘失语症’的

隐性焦虑”<sup>[15]5-11</sup>。

一些学者主张从“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文化无根性危机”<sup>[17]104-111</sup>入手,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实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以重建中国文化与文论自信,确立民族身份,并在与西方世界的对话与交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童庆炳、顾祖钊、李春青等展开的“中国文化诗学”的研究及理论建构,就是这样的理论研究与积极探索。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即是主张“将中国古代文论中有现代价值和意义的部分,转换成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sup>[16]6-14</sup>,以促进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并为世界贡献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创新成果,显然与王伟所谓“狭隘的民族自尊”云云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对此,需要细加分辨,否则就未免简单草率,典型的例子就是王伟给出的例子,即由“20世纪西方一些重要思想家的理论有不少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文论,如海德格尔之于老庄、庞德之于意象、布莱希特之于戏剧理论等”得出“中国文论的很多理论与范畴具有全球的普适性”的结论——这样“推理的跨度明显太大”<sup>[14]94-99</sup>。尽管中国的老庄、意象与戏剧理论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还有待商榷,但需要明白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理论与范畴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并不是由其是否狭隘的民族自尊所决定的,如果不具有全球的普适性,无论怎样狭隘的民族自尊都不可能使其具有全球的普适性,中国文论的很多理论与范畴也是如此。就此而言,即便一些学者“推理的跨度明显太大”,也应从中国文论及其范畴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作出考量,比如“海德格尔之于老庄、庞德之于意象、布莱希特之于戏剧理论等”是否足以得出“中国文论的很多理论与范畴具有全球的普适性”的结论,或者推翻这种结论,而不是简单地归咎于是否狭隘的民族自尊。否则,便没有理由否定这种研究及意义。当然,这样扣上一顶“狭隘的民族自尊”的帽子也许是容易的,却显然不利于对这一问题的学理分析与探讨。

总之,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思考,要面对现实,并不意味着“借口‘接地’而取消理论”<sup>[8]1-3</sup>;对域外理论不反对“拿来”,但“拿来”也是要有分辨的,并不能以所谓理论的“一般性的价值”而忽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及可能存在的不适性;反对狭隘的民族自尊,要求以更为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也不应是民族身份丧失的文化盲从,崛起的中国需要人文学者的在场<sup>[18]5-8</sup>,理论建设在面向世界

①笔者认为,王学典先生提出的理论研究者当代中国及世界交流与对话中的在场问题,不仅仅限于史学,而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具有普遍的意义,并受到启发,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的同时,也要从中国文化身份出发,从而“建构起既符合自己民族文化身份,又符合国际思潮大趋势的新的理论形态,为参与理论重构的国际大合唱,作出自己的贡献”<sup>[1]6-14</sup>,奉献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创新成果,显然不是王伟所谓“原汁原味”的“原创”所能做到的。王伟的看法在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暴露

出一些必须要予以澄清的问题。“每个合理的讨论,无论是科学或哲学的,就它试图解决某些问题而言,是合理的。”<sup>[1]9</sup>就此来说,如果讨论能真正有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就不应拒绝讨论,即便是误区,也让人明了是误区。

#### 参考文献:

- [1] 李自雄. 论“反本质主义”之后的文学理论重建[J]. 文艺争鸣, 2012(1): 20-27.
- [2] 李自雄. 值得追问的“中国问题”[J]. 文艺争鸣, 2013(1): 15-18.
- [3] 李自雄. 关于反本质主义的三个关系问题[J]. 文艺争鸣, 2013(5): 32-35.
- [4] 王伟. 中国问题、文论旅行与原创焦虑[J].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1): 94-99.
- [5] 王伟. 何谓文学学论争的“中国问题”[J]. 文艺争鸣, 2012(7): 14-17.
- [6] 雷蒙德·威廉斯. 漫长的革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111.
- [7] 曾繁仁. 中国文艺美学学术史[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0: 217.
- [8] 高建平. 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J]. 文艺争鸣, 2012(1): 1-3.
- [9] 王伟. 反本质主义、文论重建与中国问题[J]. 文艺争鸣, 2013(1): 19-23.
- [10] 周宪. 文化研究: 为何并如何? [J]. 文艺研究, 2007(6): 21-26.
- [11] 沈立岩. 关于文论“失语”和“话语重建”的再思考[J]. 南开学报, 2001(3): 82-87.
- [12] 古风. 20世纪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的主流话语论析[J]. 学术月刊, 2002(7): 13-19.
- [13] 代迅. 文明重心的东移与本土传统的复兴[J]. 文艺评论, 2008(2): 4-20.
- [14] 赖大仁. 新时期三十年文论研究[J]. 文学评论, 2008(5): 13-17.
- [15] 李西建. 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建[J]. 文学评论, 2007(5): 5-11.
- [16] 顾祖钊. 中国文论家: 该换一种“活法”了[J]. 文艺争鸣, 2013(1): 6-14.
- [17] 党圣元. 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4): 104-111.
- [18] 史学家, 王学典. 崛起的中国需要历史学家的在场[J]. 史学月刊, 2013(5): 5-8.
- [19] 卡尔·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284.

## Chinese Issues,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novation of Theory

—An Answer to Dr. WANG Wei

Li Zixiong

(Colleg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dong 264209,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issues” needs to face the reality, which does not mean canceling theory. It doesn't oppose borrowing from foreign theories but advocates discernment, which is against ignor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issues” on the basis of “general values”. It argues against narrow-minded national pride but advocates a more open and tolerant attitude towards foreign culture, which also does not mean to lose the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following western culture blindly. A rising China needs the presence of humanists. Our construction of theory should not only be directed towards the world and but also start from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to realiz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and contribute theoretical innovative achievement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ese issues; national identity; innovation of theory

[责任编辑: 箫姚]